

東坡兵書《殘儀兵的》真偽考*

王 睿

日藏漢籍中有一部罕見的兵家著作《殘儀兵的》，署名蘇軾，此書僅見日本，有寫本與刻本，但是在中國卻從未著錄和收藏。中國蘇軾研究者極少提及此書，僅一九九八年《四川省志》稱“蘇軾以策論、詩詞等方式闡述戰略戰術和治軍用兵、安邊禦敵方略，並撰有《殘儀兵的》一卷^①”，認為《殘儀兵的》為蘇軾所撰兵書。日本收藏的現有蘇軾著作中，子部類兵書僅此一部。那麼，這部書是否蘇軾傳世不廣的亡佚之作？這樣的珍稀漢籍為何在中日學界都無人關注？

筆者通過調查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與公文書館內閣文庫所藏的兩種和刻本《殘儀兵的》，以及日本平藏貞丈所著的《殘儀兵的辨》，可以確定此書為室町時代（一三三六—一五七三）末日本人偽託東坡之作。此書雖是偽作，但其偽造的動機、方式和傳播活動，都反映了古代日本漢學者對中國典籍的接受。

一、《殘儀兵的》的版本與著錄

在現存書目中，《殘儀兵的》大多都被當作蘇軾的作品著錄。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內閣文庫和中國的地方誌，都還將其作為中國古籍罕見的“海外遺珍”來看待。如高橋智稱：

《殘儀兵的》一卷，蘇軾撰。北宋著名詩人蘇軾以歷史事件和兵法書為依據，闡述了他對政治和軍事的心得。從“兼略之儀”到“漢傑之

儀”有十二個項目，所以也被稱為“十二儀”。此書沒有傳到中國，在日本也只傳了一部室町時代的古寫本。隨著近世初期的活字印刷的出現，此書在江戶時代又繼續出版。^②

上文提及的日本多種古籍書目和網站基本都著錄作者為“蘇軾”，沒有提及作者為其他人的可能性。前文提到的一九九八年《四川省志》也持同樣觀點，認為《殘儀兵的》為蘇軾少見的軍事著作，但並未提到文獻依據，很可能是從日本館藏書目或網站資料庫查到了署名蘇軾的《殘儀兵的》，未加辨析就接受了這種說法。然而，在江戶時期就有學者伊勢貞丈認為《殘儀兵的》實為偽書。他撰寫了《殘儀兵的辨》，認為作者當是日本古代的僧人。近藤瓶城也贊同這一說法。^{③④}《殘儀兵的》為“漢籍”中的子部兵家類，但是此書與一般武人所著的兵法書有很大不同，很少談具體的用兵之法，卻經常引述《戰國策》《蒙求》等書中故事，用以說明治國用兵之道。

《殘儀兵的》中國各類書目中均未著錄，各類古籍資料庫也無檢索資訊。該書僅藏於日本，署名蘇軾，各本均為一卷。日本京都大學東亞人文情報學中心資料庫著錄三種。一為慶長年間（一五九六—一六一五）鈔本，藏于蓬左文庫，未見；二為寬永年間（一六二四—一六四四）活字江戶刊本，藏於國會圖書館。開本高二七·九釐米，寬一九釐米。版框高一九·三釐米，寬一五·一釐米。黑口，左右單邊，雙魚尾。半葉十行，滿行二十字，無界行。版心記“兵的”。封面題簽為“殘儀兵

的“，下有小字”完”。序在首頁，題“殘儀兵的並序”，署名“蘇子瞻”。無跋，文末題“殘儀兵的終”，下有藏者注，又謂十二儀。有和刻本訓點標記，天頭地腳有收藏者手書批註及朱筆標記。有“蕩潢精舍”、“榭原家藏”，故榭原芳野納本“印，可知此本為大學頭林復齋（一八〇〇—一八五九）及學者榭原芳野（一八三一—一八八一）舊藏。林復齋為江戶初著名漢學者林羅山（一五八三—一六五七）後代，此本當為林羅山舊藏。據《林羅山年譜》文祿九年林羅山親筆藏書目錄中就有《殘儀兵的》。三為文化三年丙寅（一八〇六）對寬永刊本的重印本，藏于內閣文庫。開本高二七·五釐米，寬一九釐米。版框高一九·三釐米，寬一五·一釐米。封面題簽“殘儀兵的”，下有小字“全”。序言頁有“淺草文庫”，日本政府圖書“印，末頁有“昌平阪學問所”，文化丙寅“印記。此本的版框資訊與字體與寬永本完全一致，可知是用寬永的原版重印。此本的訓點標記與寬永本不同，無批註，有日文訓點。為文化三年（一八〇六）日本著名學塾昌平覺的藏書，當為日常授課所用白文本。

高橋智《殘儀兵的一卷解題·抄录》称还有几种版本：最早的为室町时代（一三三六—一五七三）的古写本，又有日本武雄市历史资料馆藏藤原贵明天文十七年（一五四八）抄本，此后有庆长年间（一五九六—一六一五）活字本，又有庆长至元和期间（一五九六—一六二四）活字本。室町寫本與兩種活字本筆者未見，但據高橋智《解題》可知上述幾種活字本與寬永本為同一版本系統，不同在於慶長本每半葉九行十六字，慶長元和本每半葉十一行二十字，版式與筆者所見寬永本不同。長澤規矩也還在《日光山〈天海藏〉主要古書解題》中著錄了一種版式為九行十八字的版本。

此書在日本的許多圖書館資料庫中均有著錄。如《國立國會圖書館所藏貴重書解題》第二卷《古活字版之部》著錄了慶長元和刊活字本

和寬永本的信息。^⑥《內閣文庫圖書目錄》著錄寬永本，將其分類為“漢書門”。^⑦《龍門文庫善本書目》著錄了慶長中刊古活字版和慶長元和中刊古活字版兩種的版本資訊。^⑧此外《高木文庫活字版目錄》^⑨《賀茂社禦文庫書籍目錄》^⑩《弘文莊待買古書目》^⑪《三手文庫書籍目錄》^⑫《古活字版之研究（增補版）》^⑬《日光山〈天海藏〉主要古書解題》^⑭也均有對其各版本的著錄。從著錄資訊來看，此書被反復刻板和印刷，說明此書在日本古代非常受到重視，擁有較多的讀者群體，或許與蘇軾巨大的影響力有關。

總體來看，《殘儀兵的》在日本出現時間較早，傳播時間長，從室町時代（一三三三—一五七三）到江戶末期都有存世，雖然傳世的版本不多，但作為一卷本的小書，被多次刊刻，還能夠成為昌平覺教學所使用的圖書，可見其影響力之持久。

二、《殘儀兵的》的體例和內容

《殘儀兵的》全書規模很小，僅有一卷十三葉。序文占首葉四分之一，後四分之一為目錄。序文為：

夫可有天下有國有家者，不可不專文武也。所以者何？以文道主天下者，多智略矣。以武道主天下者，縱雖無留名于後代，而已其國君臣共熟文武二道者，是長國之徵也；又君臣驕奢不試，文武專以金銀珠玉為寶，以錦繡文綺飾身，不舍淫佚之樂者，是亡國之徵也。夫雖學文立武，不可不試四書也。雖學四書，不可不專《魯論》也；雖學《魯論》，不可不試《三注》也；雖學《三注》，不可不專《蒙求》也；雖學《蒙求》，不可不試《七書》之兵規也。雖學兵規也，莫不專此書而主天下。故曰《六韜》，周二王並呂望之所著也。《孫子》十三篇，齊孫武所著也。《吳子》，魏兵法也。《三略》，漢張良所著。《司馬

法》，司馬穰苴兵法也。《尉繚子》，梁惠王所學之兵法也。《太宗問答》，唐太宗與李藥師問答也。後代君臣雖學故人所解，不持心，唯誦空文而已。將及於出陣，不愛其妻，依不忘女榮（榮），向敵必有欲走北之心也。^(15 P.1)

從序文來看，此書署名“蘇子瞻”，借助蘇軾名聲作偽的意圖非常明顯。此序文模仿了策論的形式，但文筆拙劣，與宋代書序風格差異很大。此文的大致意思是治國要重視武道，當學兵規，“專此書而主天下”。文章的風格類似於明代的八股文，語言淺白，這顯然不是蘇軾序跋的風格。蘇軾序跋文的特點是隨物賦形、任意揮灑，說理、敘事錯雜，顯示出卓越的學術水準和哲學感悟，敘事筆端常帶感情。宋人序跋多是如此。而此序文無落款，無時間，無職官，文筆拙劣，不合宋人序跋形式。此文結構也不完整，“向敵必有欲走北之心也”一句戛然而止，文氣意脈中斷，似乎並不完整。

編排體例仿效《論語》，全書分為“十二儀”：兼略之儀、當略之儀、堯世之儀、蠡胥之儀、秦士之儀、齊后之儀、魯婦之儀、周公之儀、周君之儀、仲景之儀、漢臣之儀、漢傑之儀。各條目的篇幅差異很大，體例也並不統一，且內容舛雜。

如《兼略之儀》之前四條：

① 罰無道，賞有道。殺之可也。

（分其善惡者也）

② 殺無道已，亦無道者，如秋雨落白露而共消。

（易亡者也）

③ 攻其國，愛其民，攻之可也。以戰止戰，難（雖）戰可也。兵法曰，冬夏不起師，所以愛民。

（有寒暑之勞也）

④ 兵法曰：莫輕其君重他君。

（是逆臣也）^(15 P.2 a)

全書編排體例近似《論語》，由若干條組成，每條從數字至數百字不等。每一條皆由兩部分組成。第一部分（括弧外部分，頂格）闡述具體的兵法策略，是為正文。第二部分（括弧內的部分，空一格）是對正文的按語（或者類比之事）。如《兼略之儀》第一條“罰無道，賞有道，殺之可也”為正文，而“分其善惡者也”為按語。各條目的篇幅差異很大，如《兼略之儀》前十二條無論正文按語，都僅有十幾到三十幾字，但到了第十三條篇幅突然變大，正文有六十三字，而按語部分長達一百九十多字，講了郭巨埋兒的故事。後文有的長達數百字。篇幅長短不一，按語是評論正文還是引述故事也沒有規律，沒有固定的體例，顯示出編者的隨意任性。

此外，全書“十二儀”的主題和內容也沒有統一標準。《兼略之儀》共計二十七條，多從政治、思想的宏觀角度來論述兵法。如第二十五條“故曰：賢伴聖，亂伴不肖，運伴義，亡伴欲。”^(15 P.6 a)談治國。《當略之儀》則談到具體的兵法，如會涉及“察軍之法”“守城之法”，如“察軍之法曰：敵人圍吾城，近江湖水邊，如魚鱗，如蛇曲陣則前不可伐之。”^(15 P.7 b)而後面的秦士之儀、齊后之儀、魯父之儀、周公之儀、周君之儀、仲景之儀、漢臣之儀、漢傑之儀均僅有一條，是以秦士、齊后、魯父等人的故事來說明軍事。但引用的很多內容雖然與軍事有關，但根本不是兵法。如《秦士之儀》：莫于好文才聖，莫于嫌萬弊賢。《史記》曰：“秦始皇示群臣曰：欲漆吾城，可也否？”群臣不言，時優旃抽曰：蕩蕩冠（寇）來不能止，雖然，無陰室奈何，往何處覓串乎？始皇拍手曰：始聞聖人之語，屬秦之社稷於卿，受專國務也。”^(15 P.7 b)

《殘儀兵的》的書名與編纂體例極有可能受到明代丘濬《朱子學的》的影響。《朱子學的》是明代丘濬分類輯錄朱熹理學思想的著作，

此書又名《學的》，體例仿照《論語》，多用“朱子曰”引出朱熹語錄。書分上下二卷，上卷又分下學、持敬、窮理、精蘊、須看等十篇，下卷分上達、古者、此學、仁禮、為治等十篇。上卷十個篇章側重於由事以達理，首篇總論為學之道；第二篇、第三篇論述用功之要；第四篇至第九篇在於闡述學者由下學人事而上達天理的不同方法與階段；第十篇仿效《論語》的《鄉黨》篇，列舉朱熹的生平行狀。下卷十個篇章側重於由理而事。而《殘儀兵的》的體例也仿效《論語》，以“兵法曰”引出《武經七書》等書的內容，然後進行闡釋和發揮，類似於“經”和“傳”的著述方式。第一部分《兼略之儀》也是總括，後幾部分再分述。《堯世之儀》等篇之後均是以故事說理。《兵的》《學的》書名和體例都很類似，可以推測《兵的》的編纂受到了《學的》的影響。

三、《殘儀兵的》的作者

此書的作者是一個漢學功底不足的日本人。第一，其行文大多不符合漢文文法。句子生硬編造，將古代日文文法和漢文文法混雜，所以讀起來艱澀難懂。此書還有大量的錯別字和常識性錯誤。比如上面所引的《秦士之儀》中的內容來自《史記·滑稽列傳》，但原文中的皇帝不是秦始皇而是秦二世，其中“蕩蕩寇來不能止”難解其意，但核對原文後發現是“蕩蕩寇來不得上”，可見《殘儀兵的》的作者漢學功底極差。錯別字雖有可能是傳抄造成的，但錯的如此之多如此離奇，很難說和作者沒有關係。第二，文中引用古書的地方很多，但所引的文獻很多沒有來源。書中引文有一些標明了原書的名稱，如《素書》《蒙求》《史記》《六韜》《司馬法》等，有些可以找到出處，但內容被作者大幅修改。有很多引文不標具體書名，根據文獻內容也很難找到原文出處。如文中多處稱“兵法曰”，但卻不說明出自哪部兵書。筆者將“兵法曰”

所引的文獻內容，選取關鍵字在中國的“四庫全書電子版”“中國經典古籍庫”等資料庫中檢索，均找不到出處。這些內容大部分均係作者編造，並無實據。書中一些關於書名或人名的內容，筆者發現大部分也都找不到出處，或者雖有出處但經過了很大的改動，如《漢傑之儀》記載的張良之事。可知此書的引文，除少量來自中國古書外，大部分均為作者杜撰。

關於《殘儀兵的》的作者，日本江戶時期漢學者伊勢貞丈提出認為並非蘇軾，而是日本僧人。《殘儀兵的辨》僅一卷，收入伊勢貞丈《安齋叢書》，因全文為古日語，理解難度較大。可能正是這個原因，當代學者對這部託名蘇軾的偽書《殘儀兵的》研究不多。伊勢貞丈（一七一—一七八四）姓平氏，號安齋，又稱平藏。江戶中期學者，是幕府時期的士族¹⁶。他在日本古代典章制度和名物考據方面的成就很大。他撰寫了《殘儀兵的辨》一文，認為：

《殘儀兵的》一書調為蘇東坡著，因其篇首署名蘇子瞻。其第十二篇《漢傑之儀》有張良得神女傳授《六韜》之記，或其文見於唐土，所說有據。予所見之《兵的》，其全篇為日本人不文才之偽作者也。文章甚拙，斯文敗壞，于文章之巧拙毫無見識。余謂其文甚拙，非東坡所書明也。辨明全篇甚煩，僅由《漢傑之儀》一篇所見文字增減書改如左，由義理判斷，不及文章之拙處可辨，其偽書可知。予改善其文，與東坡之筆相比較。^(31a)

伊勢貞丈認為或許蘇東坡曾經有過一部《殘儀兵的》，但自己所見到的這部《殘儀兵的》卻是沒有文才的日本人的偽作。他僅以其中《漢傑之儀》一節為例，對其中張良得神女傳授《六韜》的故事進行分析，從文辭、句法和文化等方面辨析。結論是《殘儀兵的》為無文才的日本人所作，偽託蘇軾，實際目的是宣揚佛法，作者應當是日本古代的僧人。此後近藤瓶城等人所編的《續史籍集覽》中也有《殘儀兵的辨》的解題，

同意伊勢貞丈的說法，認為：“《殘儀兵的》為後人偽託蘇子瞻之作。辨其事，書中《漢傑之儀》一篇出於僧徒之手。⁽⁴⁾²²筆者贊同作者是日本人的看法，但認為作者不一定是僧人，更可能是受佛教影響的漢學者。

首先，《殘儀兵的》的書名具有顯著的日本文化特徵。伊勢貞丈認為書名和篇名多是日語詞彙，與中國古代的用法習慣不同。他在《漢傑之儀》標題後面注釋說：“《兵的》一書，每篇皆標明某某之儀，此之儀，二字為日本詞彙，實以，漢傑，為題。^{(3)2a}日語中，儀“字有事情之意，”漢傑之儀“即漢傑之事。《殘儀兵的》又名《十二儀》，可見全書實際就是從十二事來講用兵之道。《兼略之儀》與《當略之儀》所述雖非具體事件，但也是從綜論和專論角度來講兵法之事。”殘“字當為作偽者所加，意欲表明此書為殘本，僅存十二目。”的“本義是指箭靶的中心，”兵的“可引申為兵法的中心要義，但漢語中，兵的“一詞很罕見，《殘儀兵的》書名應是仿效當時流傳於日本的《朱子學的》而生造出來的。

其次，從書中的一些專有字詞可以判斷出作者為日本人。《漢傑之儀》中云：“而後良及於出陣”，伊勢貞丈注：“，及於出陣，四字為日本人俗文，用於征行。”《漢傑之儀》又云：“又婦人持白囊來，曰：子掛之，向敵無不勝，刀器不加於身，箭不可接於身也。良曰：此是何物乎？婦人曰：羅也。良曰：掛羅，何乎。婦人曰：夫人在母胎內，則繞之於身，雖吞三毒，不接其身。以此付與汝，此繞也。良再拜受之。”伊勢貞丈注：“，繞，字，唐土無之，《說文》《玉篇》《韻會》《字彙》《正字通》《康熙字典》其外字書無，繞，字，知此是日本人偽作。日本人拙劣文章真假可辨，此，繞，字乃偽作證據。所書張良受纜之事，此書稱為蘇東坡真作，而繞非唐土風物，此為證據。韓柳歐蘇四大家，蘇為其中一大家。《兵的》文章拙劣，作者必非其人。⁽³⁾³，繞，為日本漢字，指罩在武士背上防箭的布織品，又稱母呂、

保呂、保侶、母廬、母衣等，是一種披掛在鎧甲背上，用於避免流矢射擊或裝飾的布。保呂衣為戰袍，懸保呂則是一條披掛于騎馬武士的鎧甲背後的長布，自平安時代末期開始使用母呂。⁽⁷⁾書中這個日本漢字繞是特殊的日本軍事裝備，是判斷作者身份的最可靠證據。

第三，從《漢傑之儀》中作者編造的故事，可知此書作者當為平安時期深受佛教影響之人。《漢傑之儀》中記載了張良獲得兵書《六韜》的故事，但此事不同於中國史書所載，是經過日本佛教影響後編造的。原文錯誤很多，伊勢貞丈進行了刪改：

前漢張良，字子房。事高祖有功矣。初，良宿於穀（穀）城，夜夢一婦人，袖書來告良曰，汝讀之，佐漢王，如不解，隨教往鶴林山，見一石，色金黃，其石碎開，童子出焉。良問曰，何人。曰予不生不死者也。良語所夢，童子解書，曉之。良拜歸焉，而後良出師時所夢，婦人來授白囊於良，曰，汝被之，頌：念彼觀音力，眾怨悉退散，則刀鋒矢鏃不能傷矣。曰是何物，曰羅也，夫兒在胎中被胞衣，以防食毒，斯羅象之，汝勿疑矣。良再在拜受之。婦人禦雲，翩翩升去焉，而整師伐楚，大勝。蓋因神助也。而後二百年，有會祝者得金版於穀城下。版鐫籤符曰：夢裡婦人太公望，太公望乃觀世音。石中童子黃石公，黃石公乃摩利支天。一卷神經號素書，六軸秘書稱六韜。傳授張氏佐漢王，莫許一見不賢人。⁽⁸⁾

市島謙吉《文墨餘談》之《日本偽書一斑》稱：“又有一書與軍事無關，即託名蘇東坡的《殘儀兵的》。今深思之，此書實為託名偽書。其書言太公望化身婦人，托夢張良，授其《六韜》。末尾云太公望為觀世音，黃石公為摩利支天，引用《普門品》之經文，必定受本地垂跡說的影響。借東坡之名，為可笑之事。⁽⁹⁾他所說的“本地垂跡說”，是日本神道教在平安時代中期之後，與佛教的天台宗、真言宗的教理融合的產物。”本地垂跡“，是說作為本源的佛，為了救助眾生，往往垂跡

于四方，以其他神的姿態出現。《法華經》便把本元的釋迦作為“本地”，而把釋迦在現世的化身稱為“垂跡”。日本的一些人活用印度佛教“本地垂跡”思想，說日本神道中的諸神，都是佛與菩薩的“化身”。日本平安時代大約在西元七九四年至一一八五年，“本地垂跡”說出現于平安時代中期，而上文的“白囊”（即纒）出現在平安時代末期，綜合起來看。此書的創作年代上限不早于平安時代末，因為文中濃厚的佛教色彩，伊勢貞丈、近藤瓶城等人判斷作者為當時的僧人。

最後，筆者認為相比僧人，作者更有可能是深受佛教影響的漢學者，即平安時代以後，深受佛教影響的公卿、將領。因為《殘儀兵的》書中主要討論的問題核心都圍繞忠君和治國展開。他在序文中多次提出要重視武道，在正文中也多次提到如何知兵、如何禦下、如何平衡文武、如何攻伐、如何考慮武備，均是為統治者謀劃的策略，因此作者或許是幕府中的公卿或將領，他對兵書有所瞭解，應當熟知軍事與政治，又深受佛教影響。但其漢學功底又沒有達到非常精深的程度，所以偽造的書有很多破綻，甚至連中國沒有“纒”這種東西都不知道。

四、《殘儀兵的》的編纂時間

日本最早的《殘儀兵的》為一部室町時代（一三三六—一五七三）的古寫本，故此書的著述年代下限為室町時代，年代上限根據上文考證，不早于平安時代（七九四—一一九二）末期。綜合來看，筆者認為其編纂時間大致應該在室町時代後期的十六世紀，可能在一五〇〇至一五四八年之間。

第一，《殘儀兵的》署名蘇軾，顯然受到日本室町時代日本五山僧人研讀蘇軾風氣的影響。蘇軾的作品雖然在此前就已經傳入日本，但直到五山禪僧廣泛研讀注解後，才造成了廣泛的影響。王水照先生《蘇軾

作品初傳日本考略》提出，平安朝後期至鎌倉時期（一二至一三世紀）蘇軾著作已傳入日本，此後的五山文學時期蘇軾的詩文集更是造成了很大的影響，在日本傳播比較興盛²⁰。在日本鎌倉、室町時代（二四—一六世紀），蘇軾著述在日本已很多，且研讀蘇詩成風，出現了日本五山僧所編的蘇詩注釋書《四河入海》，抄錄時間從大永七年（一五二七）到天文三年（一五三四）。由此可以判斷出《殘儀兵的》一書託名蘇軾，應當是希望借助蘇軾的影響力在日本進行廣泛傳播，並受到當權者的重視。其著述的時間應當在室町時代，這一時期是日本學蘇的高潮。陽明文庫藏有一部戰國時代近衛信尹（一五六五—一六一四）的寫本，題為《近代十三經正義次第》，是他閱讀漢籍的書目，其中就有此書，但被誤寫為“殘義兵敵”，這也可反映出此書在室町時代的流行情況。

第二，這部書應當產生于日本統治者重視軍事的時代，由此判斷，大致是在室町時代末的戰國時代，即從一四六七年的應仁之亂開始，到一六一五年德川家康發動大阪夏之戰為止。戰國時代的統治者特別重視《孫子兵法》《司馬法》《六韜》《三略》等兵書。《殘儀兵的》中直接提到的兵書名有《武經七書》與《六韜》《孫子》《吳子》《三略》《司馬法》《尉繚子》《太宗問答》等。《武經七書》包括了後面的七種書，所以考察《武經七書》傳入日本和發生影響的時代，可以據此判斷《殘儀兵的》的產生時間。南宋中期成書的第一部系統注解《武經七書》的著作，是施子美的《施氏七經講義》，在日本流傳甚廣，影響很大。翟士航認為，此書的高麗本至晚不遲於建治二年（一二七六）傳入日本。此後三百年間，《施氏七書講義》在日本主要通過抄本的形式傳播。天正四年（一五七六），作為當時日本漢學中心和高階武士教育場所的足利學校專門組織人員對《施氏七書講義》文本進行了校訂。到慶長年間（一五九六—一六一五），德川家康逐漸掌握了日本實權，令足利學校庠主釋元佶以活字刊印《武經七書》，全書于慶長十一

年(一六〇六)刊成，是為日本第一部以活字刊印的兵學典籍。由此可知，《武經七書》從傳入日本到廣泛傳播，大致是從十三世紀到十七世紀初，其造成廣泛影響的時間應該就在十五世紀到十七世紀。《殘儀兵的》是《武經七書》影響下的產物，由此可以判斷其時間。

第三，《殘儀兵的》還受到日本《古文真寶》的影響，基本可以確定產生年代在十六世紀。如《當略之儀》中載：“正兵如閑雲，奇兵可疾。士卒悉含枚，將吏不含之。”此頁天頭處有批註云：“含枚，《古文真寶》一《秋聲賦》：‘如赴敵之兵，銜枚疾走。’枚如箸，軍士銜之，禁其語。”^{157b}“含枚”源自“銜枚”，《殘儀兵的》撰者對此詞語的瞭解，很可能來自當時流行的《古文真寶》。宋代黃堅所編的《古文真寶》自傳入日本之後，影響極大，成為日本人學習漢文的重要教科書。鞏本棟先生考證《古文真寶》大致在室町時代(一三三八—一五七三)就已傳入。²⁴十五世紀到十六世紀，不斷有關於以《古文真寶》為內容的講習會的記載。五山僧人講習《古文真寶》的成果，“抄物”不斷湧現。如常庵龍崇和尚的《古文真寶抄》十卷(後柏原天皇大永二年，一五二二)、笑雲清三的《古文真寶抄》(大永五年，一五二五)、仁如集堯的《古文真寶抄》九卷(後陽成天皇慶長十四年，一六〇九)等，皆是其代表。那麼受到《古文真寶》影響下的《殘儀兵的》，著述時間最有可能是《古文真寶》廣泛傳播的十六世紀。

最後，從《朱子學的》在日本流傳的時間，可以判斷模仿其書名體例的《殘儀兵的》的產生時間約在十六世紀。中國現存《朱子學的》多為二卷本，最早的是明天順七年(一四六三)的版本。²⁵日本現存和刻本中最早的也是二卷本，為承應二年(一六五三)京都銅駝坊村上平樂寺刊本，有鵜飼信之(石齋)訓點，據明初刻本重刻。因此可以推測《朱子學的》傳入日本的時間在一四六三至一六五三年之間，《殘儀兵的》當出現於其後。又因《殘儀兵的》最早的抄本在天文十七年

(一五四八)，最晚出現不會晚於這個時間。最早不會早於戰國時代開始的一四六七年，所以《殘儀兵的》大約產生於一四六七至一五四八年之間，更可能產生於東坡抄物“最為流行的十六世紀”。

五、結論

日本這部託名蘇軾的偽書《殘儀兵的》為十六世紀的日本漢學者所作。作者並非禪僧，而是深受佛教影響的公卿、將領。從偽託蘇軾的序文及正文的忠君、治國、治軍思想可以看出，作者是對當時政治和軍事比較熟悉的人物。此書雖非蘇軾所作，但卻反映出室町時代蘇軾文化傳播和接受的社會情態。偽書的著述目的是希望借助蘇軾的文名，以及其在佛教界的影響，廣泛傳播自己的聲譽和見解。作者雖然漢文水準不高，書中內容也多有錯漏，但從其引用的漢籍書名，可以看出日本室町時代對中國古代典籍的接受情況。《殘儀兵的》是蘇軾文化在日本傳播的一個具體案例，對此問題的考辨，對於中日古代文學和文化的交流，都有重要的啟示作用。

* 本文為海南省哲學社會科學規劃重大專項(東坡文化研究)課題“日本蘇軾研究史”(HNSK [ZDZX] 24-14)階段性成果。

參考文獻

- (1) 四川省地方誌編纂委員會。四川省志·哲學社會科學志[M]。成都：四川科學技術出版社，一九九八：二三五。
- (2) 高橋智。殘儀兵的一卷解題·抄錄[EB/OL]。寬永年間活字印。國立國會圖書館デジタルコレクション。[2025-03-07] <https://dl.ndl.go.jp/pid/2532161>
- (3) 伊勢貞丈。殘儀兵的辨[M]。日本內閣文庫藏寫本，安永四年(一七七五)撰文，天明七年(一七八七)源左檀子抄寫。

- (4) 戶田氏德。續史籍集覽·番外雜書解題[M]。日本近藤活版所，明治二六—三二年（一八九三—一八九八）：二二。
- (5) 京都史跡會。羅山林先生詩集·附錄卷一[M]。日本平安考古學會，大正九年至十年（一九二〇—一九二二）：一一。
- (6) 國立國會圖書館參考書志部。國立國會圖書館所藏貴重書解題[M]。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一九七〇：五三。
- (7) 內閣記錄局。內閣文庫圖書目錄[M]。日本內閣記錄局，一八九〇：三六九。
- (8) 川瀨一馬。龍門文庫善本書目[M]。日本龍門文庫，一九五二：一〇九。
- (9) 川瀨一馬。高木文庫活字版目錄[M]。日本高木義一文庫，一九三三：四三。
- (10) 大谷大學國文學會。賀茂社禦文庫書籍目錄[M]。日本大谷大學國文學會，一九三三：七。
- (11) 弘文莊。弘文莊待賣古書目[M]。日本弘文莊，一九四〇（二三一—四）：九四。
- (12) 大谷大學國文學會。三手文庫書籍目錄[M]。日本大谷大學國文學會，一九三三：七。
- (13) 川瀨一馬。古活字版之研究（增補版）下卷[M]。日本古書籍商協會，一九六七：二二。
- (14) 長沢規矩也。日光山《天海藏》主要古書解題[M]。日光山輪王寺，一九六六：一七。
- (15) 蘇軾。殘儀兵的[M]。日本內閣文庫藏文化三年丙寅刊本，一八〇六。
- (16) 清宮秀堅。古學小傳[M]。日本玉山堂，明治十九年（一八八六）：七。
- (17) 日本平凡社編，胡毓華譯。《日本文化圖典》，四川人民出版社二〇二二年版，第三三頁。
- (18) 伊勢貞丈。《殘儀兵的辨》一卷，第四b—五a葉。此為源左檀子抄寫整理的《改舊文》，全文漢字。
- (19) 市島謙吉。文墨余談[M]。日本翰墨同好會，一九三五：五三一—五四。
- (20) 王水照。蘇軾作品初傳日本考略[M]。湘潭師範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一九九八（二）：三一六。
- (21) 池澤滋子。穎士聲名動倭國——日本蘇軾研究述略[M]。曾棗莊。蘇軾研究史。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二〇〇一：六二六—六二七。
- (22) 松尾肇子。近衛家的蘇軾詩文[M]。東海學園言語文學文化，二〇〇九（八）：三〇—三八。
- (23) 翟士航。施氏七書講義東漸及其對日本的影響[M]。人文雜誌，二〇二〇（四）：八八—八九。
- (24) 鞏本棟。略論古文真實的東傳[M]。域外漢籍研究集刊，二〇二一，二一：三七六。
- (25) 李焯然。丘濬評傳[M]。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二〇〇五：一〇〇。

（海南大學海南省東坡文化研究與傳播中心副研究員）

（立命館大學白川靜記念東洋文化研究所客員協力研究員）